

晚清革命报刊与革命文学的 理论倡导及创作实践

付登舟

内容提要 晚清革命报刊与革命思潮、革命运动相伴相随,并直接催生了资产阶级革命文学。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革命报刊以不同的形式提出了有别于维新保皇报刊的革命文学理论。这些理论既有对革命文学思想内容、文体及语言风格、革命文学的作用等共性问题的主张,也有对革命小说、革命戏曲、革命诗文等个性理论问题的阐释;二是革命报刊刊发了浩如烟海的革命政论、革命小说、革命杂文、革命诗词。晚清革命报刊借助于革命文学传播革命思想,推动革命进行;晚清革命文学借助于革命报刊,实现其革命的政治功能,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关键词 晚清 革命报刊 革命文学

付登舟,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430062

晚清革命报刊,可分为两大传播媒体,一是报纸,如《中国日报》、《苏报》、《大江报》等;二是杂志,如《民报》、《湖北学生界》、《江苏》、《浙江潮》等。其中,报纸约66种,杂志约49种。之所以在晚清最后十年出现如此多的革命报刊,是因为“20世纪第一个十年与19世纪最后十年相比,时代的主旋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呈现出鲜明的不同:如果说19世纪最后十年的主旋律是维新,那么2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主旋律则是革命”^[1]。革命报刊成为清帝制最后十年占主导地位的新闻媒体,引导着这一时期的思想潮流,使“革命”的观念取代“维新”观念而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晚清十年革命观念的形成与主导并最终导致辛亥革命的爆发与成功,得益于晚清革命报刊及其所刊登的大量革命文学理论与革命文学作品的宣传与鼓动。

一、晚清革命文学的缘起及界说

“革命文学”这一名词何时首次在中国出现,目前尚难以考证。就笔者所见到的“革命文学”,最早出现在杨守仁所著的革命宣传小册子《新湖南》(1903年出版)中:“故夫压抑者,反对之良友,而破坏之导师也。是故俄国之虚无主义,自革命文学时期,升而为游说煽动时期,自游说煽动时期,升而

[1]李维武:《辛亥革命前十年间中国现代革命观念的形成》,〔合肥〕《学术界》2011年第7期。

为暗杀恐怖时期,愈挫愈奋,愤盈磅礴,几使俄政府权力威命所及,俱陷于盲晦雨之途焉。”^[1]至于“革命文学”为何,杨氏并未说明,考查文意,当指一般性的富含革命色彩的宣传文字。

尽管“革命文学”于1903年在中国出现,但其所指乃为俄国的革命文学。中国之有“革命文学”最早见于《江汉日报》。该报于1908年5月30日开始转载当时《大阪每日新闻》,发表全面介绍晚清革命党的文章《清国之革命党》,全文共分关于革命党的有关团体、主义、领袖、起义斗争,与立宪派的严重分歧,以及清政府的镇压等六个部分,连载五个部分就被禁止刊发。该文称,革命党人积极发行图书报刊,“鼓吹排满主义,一时东京市上,出售此种之杂志,实数几达十余种之多。就中之为最盛行者,如四川人邹容、湖南人陈天华二人(二人已死),盖当时称为革命文学最盛时代也。”^[2]此后数年间,“革命文学”亦很少在报刊、杂志及书籍中见到。

1909年,柳亚子、高旭和陈去病等人在苏州成立了清末民初最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南社,南社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倡民族气节,反对满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为辛亥革命做了非常重要的舆论准备。南社既是文学社团,又是同盟会重要的外部组织,主张文学为革命服务。但南社成员都没有明确提出“革命文学”的概念。倒是曹聚仁先生评价南社诗文时认为,“南社首先揭出革命文学的旗帜,和同盟会的革命相呼应。我们可以说南社的诗文,活泼淋漓,有少壮之气,在暗示中华民国的更生。那时,年轻人爱读南社诗文,就因为她是前进的、革命的、富有民族意识的。”^[3]但曹先生并没有阐释“革命文学”的含义。那么,何为晚清革命文学?对此,汪兆铭作过很有见地的阐述:

近世各国之革命,必有革命文学之前驱,其革命文学之采色,必烂然有以异于其时代之前后。中国之革命文学亦然……盖其内容与其形式,固不与庚子以前之时务论相类,亦与民国以后之政论,绝非同物。盖其内容,则民族民权民生之主义也。其形式之范式,则涵有二事:其一,根柢于国学,以经义、史事、诸子文辞之菁华,为其枝干。其二,根柢于西学,以法律、政治、经济之义蕴,为其条理,二者相倚而亦相扶。……革命党人所以能勇于赴义,一往无前百折而不挠者,恃此革命文学,以自涵育,所以能一变三百年来奄奄不振之士气,使即于发扬蹈厉者,亦恃此革命文学以相感动也。^[4]

汪氏的这一定义,包涵以下几层含义:第一,革命与革命文学的关系,无论何种国家的革命,必然有革命的文学作为“前驱”,为革命的爆发作思想舆论动员;第二,不同时代的革命,其革命文学的特色亦不相同,如1900年至1911年的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上,既不同于其前的洋务及维新文学,亦不同于其后的政党文学,更不同于“五四”以后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第三,肯定了辛亥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存在,并指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内容为“三民主义”,其形式为中学为根基,西学为条理;第四,肯定革命文学陶冶革命党人的巨大作用。

张玉法认为:“革命文学常先革命暴动而发生,作为武力革命的前驱……,自革命文学兴,其气势磅礴,使零星的革命暴动为之失色。辛亥革命收功於武昌一击和各省响应,其所以能一击而中,此起彼伏者,实宣传之力。革命宣传之能否收到效果,决於三个因素:其一、宣传的媒介及其广布性,其二、宣传与反宣传的技巧对比,其三、所持的主义。在晚清的革命宣传上,前二个因素并不超越保守派和改革派,超越的是革命的主义。晚清革命的主义是民族、民权和民生,但最有力的是民族,包括排满和排外两方面。”^[5]

[1]张丹、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641页。

[2]《清国之革命党》,《江汉日报》1908年5月30日。

[3]曹聚仁:《南社·新南社》,柳无忌编《南社纪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8页。

[4]胡朴安选录:《南社从选》,〔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5]张玉法编:《晚清革命文学》,〔复旦〕经世书局1981年版。

除汪、张二人之外,再也没有人对晚清革命文学做界定,由于这一概念是本文论及的关键问题,故不得不界说如下:

第一,晚清革命文学在性质上属资产阶级革命文学,既不同于资产阶级改良文学,也不同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第二,在创作主体上,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革命报人及革命文人,其中有许多是兼三者于一身;第三,在内容上,以三民主义为指导,尤其注重弘扬民族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满族统治;第四,在作用上,为资产阶级革命服务,以推翻满清王朝为终归;第五,在体裁上,有政论、小说、诗词、杂文等多种样式;第六,在表现手法上,有酣畅淋漓的直白宣泄,也有含而不露的隐晦表达。

二、晚清革命报刊对革命文学理论的倡导

革命文学理论是革命文学创作的指导,引领着革命文学前进的方向。晚清革命派借助于革命报刊这一阵地,以不同的方式阐释革命文学理论。其主要方式有:第一,寓革命文学理论于发刊词之中。有的发刊词就是一篇专门的革命文论,如柳亚子的《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民报》发刊词等;有的发刊词在某一部分中阐释其革命文学理论,如张继煦的《湖北学生界》叙论、杨度的《游学译编》叙等。第二,寓革命文学理论于革命文学作品序或评论之中,如章太炎的《革命军序》、章士钊的《读革命军》、柳亚子的《胡寄尘诗序》等;第三,专门阐释革命文学理论的文章,如陶报癖的《论文学之势力及其关系》、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等;第四,寓革命文学理论于书札之中,如苏曼殊的《与高天梅论文学书》、高旭的《答胡寄尘书》、冯平的《与狄君武书》等。革命文论突出革命文学的政治功利性与社会功利性,注重革命的思想内容,追求鼓动性乃至煽动性的文学语言,倡导革命文学的引领作用。

晚清革命报刊的革命文学理论就涉及的问题而言,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革命文学的共性问题,诸如思想内容、文体及语言风格、革命文学的作用等;二是革命文学的个性问题,即专门针对不同文类的理论探讨,诸如革命小说理论、革命戏曲理论、革命诗文理论。因篇幅所限,仅就革命报刊关于前一方面的文学理论作简要论述。

在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上,革命报刊主张以革命为导向,以三民主义为内核。革命是一般文学与革命文学的根本区别。檀香山《自由新报》创刊后,高谈革命排满,无所顾忌。该报发刊词中指出:“呜呼,神州已矣,痛黄裔其长沉奴隶甘乎?哀人心之尽死……回观大陆,尽是愁城。千重之毒务重埋,半角之斜阳有限。新亭未坐,哭已失声,故国濒危,言其无罪。”“今者力唱民族,疾呼同魂”。发刊词最后表示:“谁鸣警世之钟,独树登坛之帜。先乎言论,继收实行。文字收功日,还我河山,英雄应运之秋,荡平丑虏。”^[1]《中国报序》称:“报主人见众人皆醉而欲醒之”、“因思风行朝野,感感人心,莫如报纸,故欲借此一报,大声疾呼,发声振馈,中国之人尽知中国之可兴,而闻之起舞,奋发有为也”^[2]。《江汉日报》发刊词公然宣告“张吾自由之帜”,作革命之“喉舌”^[3]。《汉声》发刊词激情满怀,壮志凌云:“惟有振刷独立精神,拔除奴隶性质,喋血苦战,以竞生存,奋其武怒,报其大耻,以揭竿而为中国倡,时不我待,丧乱弘多,投笔援剑,歌大汉之歌。”^[4]发刊词体现的是刊物的宗旨,也是其刊登的文学作品应表现的内容。呼吁排满成为革命报刊文学作品的思想主旨。《民报》发刊词可谓是最具代表性的阐述文学作品思想内容的革命文论,其严厉指责维新派报刊的文学作品夸夸其谈,不得要领,于中国病症不能对症下药:“媵词以为美,器听而无所终,摘埴索涂不获,则反复其词而自惑。求其斟时弊以立言,如古人所谓对症发药者,已不可见”^[5],并指出三民主义是拯救中国的最好药方:“今者中国以千年专

[1]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35-36页。

[2]丁守和:《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

[3]《江汉日报》,1908年3月17日。

[4]《汉声》,《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6期。

[5]《发刊词》,《民报》1905年第一号。

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是故或于人为既往之陈迹,或于我为方来之大患,要为缮吾群所有事,则不可不并时而弛张之”^[1]。要让三民主义“输灌于人心而化为常识”,必须靠先知先觉的革命文人以心血浇灌的文学作品“醒其渴睡、奋发振强”。

在文学作品的文体与表达上,革命报刊从传播革命思想的现实需要出发,提出了“言文合一”和弃文言而从白话的主张。作为革命“前驱”的革命文学,要使其所弘扬的革命之主义灌输于人之脑髓,激荡人之心灵,其前提必须是“使浅学者能竟读,读之骤解”,否则就成为“无益之文”^[2]。“一国之语言文字,歧而为二者,其国家之教育,人民之进化,必不能普及于全国上下,而学人以经世著书之具体,务求为高雅闳博之词,则文学反以阻国民之进步。”^[3]“言文合一”不仅是语言文字发展之历史必然,也是社会进化的需要。那些“斧藻其言,艰深其义”的文学作品,“使阅者如对大海而叹汪洋,如入五都之市,光怪离陆,不可思议,不可穷诘”^[4]。有鉴于此,革命报刊的文学作品必须是:“宁使国人共喻共晓”,“不愿使国人冥思穷索”^[5]。要做到这一点,其文体必然是浅显易懂的白话文。林懈在创办白话报刊时说“因为我是一个平民,所以我说白话,是一般老百姓的语言,而不是一般士大夫阶级的咬文嚼字或八股文的文章”^[6]。文言艰深,仅及上流社会,不利于文明普及,采用白话,则感人效大,易于达到“振末俗、开民智、强国家、救危亡”的社会文化功效。

在文学作品的语言风格上,革命报刊主张革命文学的语言应富于鼓动性、煽动性和通俗性。“驱以犀利之笔,达以浅直之词”^[7]。以“跳踉博跃”之言,“震以雷霆之声”,以“为义师先声”^[8]。革命文学作为文学之一种和最“上乘”的一种文学,就在于这种文学具有反抗旧势力的精神,追求人类的平等与幸福。其语言风格,必然有别于其他文学。邹容的《革命军》,就是当时革命文学的经典之作,“虽顽懦之夫,目睹其事,耳闻其语,则罔不面赤耳热,心跳肺张,作拔剑入地,奋身入海之状。”^[9]“稍有种族思想者,读之当无不拔剑起舞,发冲眉竖。若能以此书普及四万万人之脑海,中国当兴也勃焉。”^[10]章太炎看完这本书后,亦深受感染并为之作序,批评“主文讽切,务为蕴藉”^[11]的文风。含蓄蕴藉,委婉托讽,这种文学作品,很难鼓动人心,激励士气。所以倡导“跳踉博跃、叫吡恣言”^[12]的艺术风格。以这样的风格创作的文学作品,才具有“雷霆之声”的效果,即便是反动的文人诵读之后,亦会幡然悔悟;即便是“心存异志”的才智之士,亦能迷途知返;即便是“屠沽负贩之徒”也能骤解,受到启迪与感化,称得上是“义师先声”,成为鼓动人心、动员民众、组织民众的战斗武器。

在文学的功能上,革命报刊强调革命文学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论支那文学与群治之关系》从功利主义文学观出发,将中国过去亡国灭种的原因归结为封建文学,将起死回生的希望寄望于革命文学,“过去茫茫之支那历史,孰为亡国灭种之媒?曰:以文学故。未来轟轟支那之历史,孰执起死回生之济,曰以文学故。”^[13]文章历数封建文学的种种罪状:

闭塞阴险,灭人类之幸福,阻世界之进步,图现在的肉体旦夕之乐,而不知未来的种族之祸,此支那老氏之文学之祸也;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之,此为孔孟文学之祸;舞刀笔、杀同胞如儿戏,此申韩辈文学之祸也;取之锱铢,用之泥沙,剥国民之膏血以供少数之挥霍,以奉

[1]《发刊词》,《民报》1905年第一号。

[2][4][5]张继煦:《叙论》,《湖北学生界》第一期,1903年1月。

[3]杨度:《游学译编·叙》,第一期,1902年11月。

[6]转引自孙先伟:《林白水的报人生涯》,〔南京〕《民国春秋》,1998年第2期。

[7][9]爱读革命军者(章士钊):《读革命军》,《苏报》1903年6月9日。

[8][11][12]章炳麟:《革命军序》,《苏报》1903年6月10日。

[10]《苏报》1903年6月9日。

[13]《论支那文学与群治之关系》,《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5期。

外族,此管商之文学之祸也;不明种族,不识英雄,而但师左氏之谈妖怪,司马迁之述讖纬,此历史家文学之祸也;见异种则却,敌同胞则勇,此支那军事文学之祸也;作劝进之表,草投降之文,损人类之价值,长枭雄之焰,此无爱国心之文学家之祸也。^[1]

不破不立,文章试图以这样的激烈方式,冲击传统文学对中国人的牢笼,使之跳出传统文化的泥潭,以新思想、新观念,“革新各种文学”,建设富有战斗力的新文学,从而“革新各种社会”,创造新生活,建立新国家。章士钊认为,革命文学作品是导国人“脱奴隶就国民”的教科书。普及教育最重要的不是灌输知识,传授技能,而在于培育支配知识、技能的文明大脑。因为知识、技能是“受动者而非主动者也,主动之权,在乎其脑”。大脑所持主义不同,知识、技能的职能亦不同。“奴隶主义者,以其知识技能尽奴隶之职;国民主义者,以其知识技能尽国民之职。夫以奴隶主义之人,而增其知识,练其技能,则适足以保守其奴隶之范围,完全其奴隶之伎俩,将使奴隶根性,永不可拔。居今日我国而言教育普及,惟在导之脱奴隶就国民。”^[2]而“导之脱奴隶就国民”的唯一途径,就是进行革命教育,像《革命军》这样的革命文学就是最好的教科书。

《论文学之势力及关系》突出文学的社会功能,认为“无文学不足以新民”,只有文学能“撼醒沉酣,革新积习,使教化日隆,人权日保,公德日厚,团体日坚”^[3]。这里的“人权”是三民主义思想中的民权主义,这里的“团体”,不是当时遍布国内外的社团,而是整个汉民族。该文同时强调文学的政治功能,“无文学不足以立国”,“普鲁士败于法也,订约求和,偿金割地,但其遗民眷怀旧壤,作种种诗歌曲谚,不忘宗国之音,而独逸联邦卒至成立。”^[4]其文学之功,“挽狂澜于既倒,为现世收完全之效果……由是观之,则注重文学,足以兴国”^[5]。文章还指出,“印度沦为英国之墟,斯拉夫人之裂波兰,必先灭其文学,乃占领其国土,故捐弃文学足以亡国。”纵观历史,“俯视千秋、横眺六极,无文学不足以立国”。文学之所以能“新民”、“立国”,因为它有无与伦比的战斗力:“恃利喙锋牙吸髓膏髓之禽兽势力未足与之角;挟黑铁赤血操生命之战斗势力莫敢与之竞;施祈祷舞蹈灌输迷信之宗教势力、具言圣令歌独裁政体之君主势力不克以驾驭之而反屈服于其下,文学、文学,尔之势力可不谓伟矣哉。”^[6]禽兽之势力、黑铁赤血之势力、宗教之势力、君主之势力均不及文学之势力。文学如此伟大的势力,要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呢?那就是以革命文学为利器,唤醒民众,倡言革命。

三、晚清革命报刊与革命文学的创作实践

晚清革命党人、革命志士创办的一百多份革命报刊,往往以反满反封为宗旨,其刊登的革命文学作品可谓车载斗量,浩如烟海。从革命报刊创办的主体来看,有留日学生创办的,如《湖北学生界》、《江苏》、《浙江潮》等;有革命团体创办的,如《中国日报》、《民报》等;有革命志士创办的,如《江汉日报》、《大江报》、《国民日报》等。革命报刊的创办主体同时也是革命文学的创作群体。有擅长革命政论的,如章太炎、章士钊、汪精卫、胡汉民、朱执信等;有擅长革命小说的,如黄世仲、胡石庵等;有擅长革命诗词的,如柳亚子、高旭、陈去病、马君武等;有擅长革命杂文的,如于右任、公无等。这些资产阶级革命作家充分发挥自己擅长的文学天赋,创作了体裁多样、形式灵活、内容丰富的反满反封革命文学作品,并利用革命报刊这一舆论阵地传播于社会大众,为辛亥革命的爆发与成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革命政论是革命报刊的灵魂和旗帜,是革命文学的盾牌,主要论证革命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揭露君主专制与民族压迫之祸,如《国民日报》的《箴奴隶》、《说君》、《道统辨》、《上海黑暗社会自序》、《中

[1]《论支那文学与群治之关系》,《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5期

[2]章士钊:《爱读革命军者》,《苏报》1903年6月9日。

[3][4][5][6]《论文学之势力及其关系》,《江汉日报》1908年5月10日(四月十一日)。

国古代限抑君权之法》等文章,以愤激的笔墨,无情地揭露了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下中国的黑暗状况;分析了君主专制在中国长期延续的基础,批判道统这个君主专制统治的护身符;以进化论的观点得出作为历史产物的君主专制必然走向灭亡的规律。在批判的基础上宣传革命,唤醒国民意识,为即将到来的资产阶级革命作了舆论准备。

在革命派与保皇派的大规模论战中,革命派报刊刊登了大量政论文章,充分运用革命政论的巨大威力,肃清保皇立宪思想,使革命思想深入人心。在发生于同盟会成立前的1903年至1904年间的第一次论战中,孙中山在《檀山新报》上发表了《驳保皇党报》、《敬告同乡书》两篇著名文章,驳斥了《新中国报》鼓吹的“先立宪君主后民主”,“借保皇之名,行革命之实”的保皇言论,揭穿保皇党人宣称的“爱国”假面。在发生于同盟会成立后的1906年至1907年间的第二次论战中,《民报》先后刊发了数十篇革命政论,如:《希望满洲立宪者曷听诸》、《驳新民丛报最忌之非革命论》、《斥新民丛报之谬妄》、《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等。《民报》的政论赋予极端的情绪以理性的表达方式,使之极具精确的战斗性。这些文章将民族主义的极端情绪通过逻辑辩论的形式,井井有条地呈现给读者,不仅赢得了广大下层民众的支持,更使得相当一部分有识之士加入到革命派的阵营中来。对此,梁启超哀叹说:“数年以来,革命论盛行于国中,……其旗帜益鲜明,其壁垒益森严,其势力益磅礴而郁积,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革命党指政府为集权,置立宪为卖国,而人士之怀疑不决者,不敢党与立宪。遂致革命党者,公然为事实上之进行,立宪党者,不过为名义上之鼓吹,气为所慑,而口为所箝。”^[1]长期以来,政论被排除在文学之外,这对文学研究来说有利也有弊,但是,对革命文学研究而言,革命政论无论如何都不能忽视,否则其他文类的革命文学就无从谈起。晚清,革命派战胜保皇立宪派,革命政论功不可没。

革命小说是革命文学的殿军。改良派将“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的社会功能用于“新民”,革命派则将小说的强大功能用于革命。在革命报刊中,宣传反满反封建革命小说举不胜举,如《湖北学生界》的《扬州梦》、《燕子窝》,《江汉日报》的《孤雁》、《纱布厂》等。《扬州梦》以传奇的形式叙述“扬州十日”的凄惨往事,揭露满人入主中原所犯下的种种暴行,激发汉人对满人的民族仇恨,故事结尾悲愤呼号:“天荒地老情无尽,要二百前冤魂日儿瞑,除非是十八行省齐革命”^[2]。《孤雁》以隐喻的手法,歌颂“孤雁”即革命党人为拯救同胞、抵抗外患不惜捐躯的英勇斗争精神,以期警醒“醉生梦死”、大祸临头而不知觉的国民。该小说以画龙点睛之笔结尾:“惜乎醉生梦死之群雁,不知其(孤雁)苦心,预作远祸之举,仅谓扰伊清梦,怒而啄之至死。殆祸机徒发,聚族而歼,已悔无及已。呜呼!吾作《孤雁》一篇,不禁悲从中来,泪滂沱其如雨也。”^[3]类似这样的革命小说在革命报刊中随处可见,不能一一罗列。

革命杂文是革命文学的匕首和投枪,极具战斗力。革命报刊刊发了众多此类文章,如1908年上半年在《江汉日报》上发表的《贼典史》、《说死》、《最近二十年来元首之血》等文^[4]。暴露满清官场这个龌龊的世界,当官者为贼为盗,不仁不义,号召民众奋起反抗:《说死》批判国民不思或不敢反抗,贪生怕死,苟且偷生的奴隶根性,“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告戒贪生怕死者“苟延旦夕之残喘”,是“至愚极下之策”^[5];《最近二十年来元首之血》宣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该文讲述欧美各国近二十年所发生的专取“元首”的血案,颂扬刺杀暴君的英勇行为与献身精神,悲叹华夏自荆卿之后,“莫复有图溅皇王之血”的英雄。上述三篇杂文尽管作者不同,刊发时间不同,标题亦不同,却存在内在的密切联系,即

[1]梁启超:《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新民丛报》1907年第92期。

[2]《扬州梦》,《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6期。

[3]天石:《孤雁》,《江汉日报》1908年6月17日(五月十九日)。

[4]公无:《贼典史》,《江汉日报》1908年6月7日(五月初九日)。

[5]雲蒸:《说死》,《江汉日报》1908年4月18日(三月二十日)。

革命思想一以贯之。

革命诗词是革命文学的轻骑兵。大胆的夸张,新奇的想象,极富象征意义的意象群,构成情彩飞动的艺术画面。在革命报刊的作品里,萧瑟秋气、盲风晦雨、胡尘阴霾等自然景物描写多用来象征清王朝统治下的黑暗社会;烽烟、麒麟、飞瀑、火云、朱霞等意象群多用来象征掀天扬地的革命狂潮,尤其是诗词中创造的意境,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古今中外,神鬼人俗,无所不包,读之令人回肠荡气,感发兴起。例如:“民气卑微久不伸,也须从此问迷津,欲将热血炉天地,先把诚心向国民,愿学金僮驱魍魉,任他虎豹咤麒麟,何时解道能多佛,度己还须更度人”^[1],表现出作者面对民气卑微、国家危亡之际,不甘沉沦,誓死报国救民的革命英雄气概。又如:“侠气横飞走百蛮,厌听胡马啸榆关,卫公死去无边将,仆固逃亡有汉奸,壮志未能锄黠虏,雄魂犹自缚生蕃,烽烟满地容谁卧,梦到铜驼骨亦寒。”^[2]该诗借述历史,喻指现实,表现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思想。

在晚清革命思潮和革命运动的促进下,晚清革命报刊纷纷创办,革命文学逐渐兴起,革命报刊成为革命运动与革命文学互动的有力平台。尽管当时“革命文学”概念提及甚少,但“革命文学”文类齐全,有革命政论、革命小说、革命杂文、革命诗词、革命戏曲等。

综上所述,晚清革命报刊与革命思潮、革命运动相伴相随,并直接催生了资产阶级革命文学。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革命报刊以不同的形式提出了有别于维新保皇报刊的革命文学理论。这些理论既有对革命文学思想内容、文体及语言风格、革命文学的作用等共性问题的主张,也有对革命小说、革命戏曲、革命诗文等个性理论问题的阐释;二是革命报刊刊发了浩如烟海的革命政论、革命小说、革命杂文、革命诗词。晚清革命报刊借助于革命文学传播革命思想,推动革命进行;晚清革命文学借助于革命报刊,实现其革命的政治功能,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责任编辑:平 啸]

Revolutionary Newspapers and Journal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n Relation to the Theoretical Advocate and Writing Practice of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Fu Dengzhou

Abstract: Revolutionary newspapers and journal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going along with revolutionary thought and movements, directly germinated capitalist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which can be shown in the following two aspects. On the one hand, revolutionary newspapers and journals advanced revolutionary literary theories in various forms, which are distinguished from those from reformist royalist newspapers and journal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published extensive revolutionary political commentary, novels, argumentations, and poems. By virtue of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revolutionary newspapers and journal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spread revolutionary thought, pushing forward revolutions; in turn, by means of revolutionary newspapers and journals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fulfilled its revolutionary political function.

Keywords: the late Qing Dynasty; revolutionary newspapers and journals;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1] 呆汉:《春雨无聊拉杂成此》,《江汉日报》1908年6月18日(五月二十日)。

[2] 梵宇:《感梦》,《江汉日报》1908年4月18日(三月十八日)。